

作者信息:

王典（通讯作者），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直接投资；电话：19854163038；E-mail: dannywang97@163.com

李增刚，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制度经济学研究》编辑部主任；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电话（同微信）：13583188223；E-mail: casslzg@126.com

姜凯，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直接投资；E-mail: 17863152368@163.com

[声明：该文章尚未发表](#)

制度型开放会缩小企业间收入差距吗？——基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准实验

摘要：通过对标国际通行准则，实现制度创新的制度型开放战略有利于中国与世界经济安全有序融合的同时，也可能会影响国内收入分配结构。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实现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抓手，本文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作为准实验，基于2009—2021年上市企业数据，考察制度型开放对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度型开放的推进显著降低了企业间收入差距；机制研究发现，制度型开放通过对标国际准则，优化国内制度带来的市场竞争效应和融资约束不平等程度降低是导致企业间收入差距降低的可能渠道；扩展分析发现，制度型开放在降低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同时，并没有显著增加企业内收入差距，即企业间收入差距的缩小没有被企业内低收入群体所承担，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本文研究结论为对外推进制度型开放战略和实现国内共同富裕建设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制度型开放；营商环境优化；自由贸易试验区；企业间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 F249.2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Opening up to widen the income gap has many proponent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Building a pilot free trade zone is a key initiative to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 China. Will the system-based opening up in the new era increase the income gap? How to build a high level of openness to the outside world while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o answer these two question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FTZ construction on inter-firm income disparity based on the data of listed enterprises from 2009 to 2021, using FTZ construction as a quasi-experiment. It is foun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TZ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inter-firm income gap. Specificall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TZ policy led to a 6% decrease in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inter-firm income gap. The market competition effect from institutional optimization and the reduction of inequality in financing constraints are possible channels of influence. The extended study finds that the FTA reduces the inter-firm income gap without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the intra-firm income gap.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have som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institutional-based opening in China.

Keywords: Intra-firm Wage Dispersion; Institutional-based Open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一、引言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也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李实和朱梦冰，202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目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宏观层面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微观层面的企业间、个体间收入差距仍然严重。因此，如何在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缩小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学术界和实务界所急需解决的重大议题。

制度环境优化是完善市场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以及促进机会均等的重要手段。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依赖经济特区政策构建“政策洼地”，快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近年来，中国为应对外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以及内部经济增速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新形势，对外开放已经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卓乘风和毛艳华，2023）。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推动制度创新，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是党中央赋予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一项以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的制度创新对经济要素流动、居民就业以及社会福利具有重要影响（许晨曦等，2023）。

近年来部分基于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指出，企业间工资收入差距扩大是造成整体工资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杨继东和江艇，2012；Akerman 等，2013；Helpman 等，2017）。Barth 等（2016）研究指出，美国中约有 2/3 的工资收入差距可以归结为企业间工资收入的系统性差异。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其 4/5 的工资收入差距可以归结为企业间工资收入的系统性差异（Benguria, 2015）。直观上看，一方面，通过对标国际规则，有利于提供给国内企业更加公平的营商环境，有利于提升弱势企业的竞争力，改善企业间收入差距；另一方面，营商环境优化有利于对垄断等不正当竞争形成限制，使得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影响企业间收入差距；最后，党中央对自贸区提出的“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要求，权力下放有利于自贸区加强内部市场化改革以及帮扶弱势企业的决策自主性，影响企业间收入差距。那么，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抓手的制度型开放战略是否有助于缓解企业间收入差距？其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既有文献在探究制度型开放如何影响企业间收入差距的研究中仍然处于空白，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关键时期，厘清对外制度型开放与国内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对于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准自然实验，对制度型开放对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本文的其余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第三部分是制度背景介绍与

理论分析；第四部分是数据、变量和研究设计；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第六部分是机制检验；第七部分是扩展分析；第八部分是结论与建议。

二、文献综述

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为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表征的制度型开放对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与本文联系密切的文献主要有两支：第一支文献是关于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效应评估；第二支文献是关于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

（一）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效应评估

自 2013 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以来，学者们关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经济效应展开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现有文献关于自贸区经济效应的研究可根据研究对象区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

首先，部分学者从宏观角度切入，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国际资本流动（韩瑞栋和薄凡，2019；李小帆等，2023）、地区经济增长（王爱俭等，2020）、出口贸易和跨境数字贸易（蒋灵多等，2021；李子联和刘丹，2021；王智新等，2023）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周文慧和钞小静（2023）认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通过聚集高端要素、优化产业链布局以及增强市场竞争力等方式显著提高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王明益等（2023）基于空间断点设计，研究指出贸易试验区通过制度创新，为市场主体提供更优质的制度环境，使得区内经济主体的协同创新能力和整体协同创新网络得到显著提升。尽管区域协同发展获得了众多研究支持，但仍有研究对此结果提出质疑，韩振国和朱洪宇（2022）基于夜间灯光数据分析指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只能提高了试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其产生的“虹吸效应”可能抑制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其次，为避免宏观研究在处理内生性方面的劣势以及对影响机制解释的模糊性，越来越多的研究将视角转向微观企业，实证检验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微观主体行为的影响。具体地，刘文革和何彤彤（2022）研究指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制度优化带来的融资约束的缓解显著提升了企业进行直接投资动力。随着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带来的市场环境优化，企业的财务状况更加稳定，显著增加创新投入，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联通效应，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显著加速（任晓怡等，2022）。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新时代改革开放“改革的高地”，作为制度创新“试验田”，自由贸易试验区带来的制度环境优化是其核心作用。许晨曦等（2023）研究指出自由贸易试验区带来的制度环境变革改善融资环境，进而使得企业融资的方式发生转变。融资环境除了能够带来企业融资方式的改变，还有助于优化服务业企业中的资源配置（黄少安和孙璋，2023）。

综上所述，尽管已有文献从生产率、创新和经济增长等多角度切入进行深入研究，但无论是宏观层面的研究还是微观层面的探索，现有学者均重点关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经济效应，从劳动者角度分析自由贸易试验区效应的研究相对匮乏。劳动者是消费产能的最终主体，

是扩大内需助力内循环畅通的核心参与者。除了关注自由贸易试验区带来供给侧绩效提升“做大蛋糕”，更多关注如何在需求侧“分好蛋糕”，有利于实现以“外循环”助力“内循环”构建，对加快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参考意义。

（二）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

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是劳动经济学中经久不衰的议题，根据研究的角度可以将收入差距分为供给侧劳动者整体工资不平等（张川川，2015；吴万宗和徐娟，2017）、个体特征带来的收入差距（Dai 和 Xu，2017；赵春明和李宏兵，2014）以及需求侧企业内收入差距（王筱筱等，2023；李磊等，2023）、企业间收入差距（Aghion 等，2002；Faggio 等，2010；叶林祥等，2011；刘灿雷和王永进，2019）和行业间收入差距（陈钊等，2010）等多种形式。多种形式的收入差距测度不仅意味着收入差距指标度量的复杂性，还意味着对数据质量有着较高要求。现有研究关于企业间收入差距的讨论相对缺乏，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进行重点研究。

关于企业间收入差距的研究可分为理论和实证两类。理论研究方面，以 Melitz（2003）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分析框架为研究者开展企业间收入差距的理论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早期研究假设劳动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劳动要素依赖完备的信息和自由流动的特性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即具有相同特征的劳动要素获得的收入相同。此时，企业间收入差距完全来自于企业内部的要素结构差异（Yeaple，2005；Verhoogen，2008；Bustos，2011，Sampson，2014）。尽管该理论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但过于严格的前提假设对客观现实的刻画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因此，学者引入劳动力市场摩擦进一步放松假设，研究发现雇主与雇员之间的搜寻和匹配（Helpman 等，2010）和效率工资（Amiti 和 Davis，2012）等因素带来了劳动力市场摩擦，这会使得具有相同特征的劳动者所得收入不再相同。此时，企业间收入差距更多取决于企业间的固有差异而非劳动者自身差异。具体而言，经营绩效是企业改变其对员工薪酬支付的直接反映因素，通常企业经营绩效越好，其员工所得收入越高（Davidson 等，2008；Macis 和 Schivardi，2016）。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的经营绩效内生于企业自身特征，经营绩效同时引致企业自身特征调整，这种内生互动可能强化企业间绩效的差异，这与绩效工资带来的企业间收入差距并不矛盾。正如异质性企业理论所指出，生产率高的企业具有更高的概率进入国际市场，进入国际市场带给企业自身利润、技术和创新管理模式等方面的进一步提升同样会继续提高企业自身生产率（Redding，2011），如此繁杂的内生过程最终表现为企业异质性，企业异质性导致了企业间收入差异的根本原因；

实证研究方面，Akerman 等（2013）基于瑞士的数据研究发现整体工资不平等主要来自行业内企业间收入差距，即具有相同技术特征的员工往往存在较大的工资差距。Helpman 等（2017）使用巴西数据对 Helpman 等（2010）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到了与 Akerman（2013）相同的结论，即企业间收入差距是在整体收入不平等中占据重要位置。刘灿雷和王

永进（2019）将中国 2001 年加入 WTO 带来的出口规模突增视为外生冲击，使用工业企业数据中的出口企业实证研究发现出口导致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增加，进而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收入差距的不断增加提供了一种解释。与之不同的是，新一轮制度型开放主要对表国际规则，而非降低贸易壁垒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刚性”举措，前者更注重规范性，后者更注重市场化性。两次开放举措的侧重点差异，可能对微观主体产生差异性影响，有必要对此进行实证探索。现有研究关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企业间收入差距影响的文献较为匮乏，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以构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抓手，通过对标国际经贸规则实现“制度型开放”，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举措，国外学者受限于研究背景限制对此问题关注不足；另一方面，鉴于微观调查数据中特征指标更为丰富，尽管企业间收入差距在影响整体收入差距的解释力更高（Helpman 等，2017），但国内学者更多关注技能工资差距、性别工资差距等其他维度的收入差距问题，对企业间收入差距这种中观的指标关注较少。在作者目之所及的文献中，只有许晨曦等（2023）研究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收入分配效应，其重点关注的是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内劳动收入份额而不是对收入差距。本文重点关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首先，现有研究集中关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对经济增长和协同发展等方面的研究，本文拟补充其对收入分配的研究；其次，现有关于收入分配的影响较多关注劳动收入份额和个体特征差异带来的收入差距，对在整体收入差距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企业间收入差距关注较少（Akerman 等，2013；刘灿雷和王永进，2019），本文重点关注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对研究企业间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补充。第三，本文以自贸区建设作为制度型开放的表征，从理论分析制度型开放如何影响企业间收入差距并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从市场竞争和融资约束等角度对其作用机制展开探索。

三、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运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推动国内制度创新的重要抓手¹。自由贸易试验区不同于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通过签订双边或多边协议约定对贸易往来施行优惠政策的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也不同于向企业或其他经济主体提供优质经营条件的“自由贸易园区”。与“自由贸易园区”这种“政策洼地”不同，中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专注于对接国际先进经贸规则，是依赖制度型开放推动实现中国高水平开放的“改革的高地”（佟家

¹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中指出，“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起来，在有条件的区域率先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栋等, 2022), 最终得到在全国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型开放经济体制。中国首批自由贸易试验区为 2013 年上海自贸区, 截止到 2023 年 6 月, 中国已设立“1+3+7+1+6+3”六批次 21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六轮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渐成“雁阵”, 初步形成区域协调、陆海统筹的新型开放格局。自由贸易试验区着眼高标准贸易和投资规则, 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为市场中的经济主体提供更加灵活、公正和高效的营商环境。例如, 在“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的口号下, 为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探索出“负面清单”、“证照分离”和“单一窗口”等多种制度创新成果。2021 年, 21 个自贸试验区利用外资增长 19%, 比全国高出 4.1 个百分点。外贸进出口增长 29.5%, 比全国高出 8.1 个百分点。自贸试验区面积虽小, 却占到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 18.5%, 全国进出口总额的 17.3%, 为外贸外资基本盘的稳定作出了贡献¹。表 1 整理了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历程。

表 1 2013~2020 年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历程

设立批次	设立时间	设立地区	片区分布	批次特点
第一批	2013 年	上海市	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	发展改革试验田
第二批	2015 年	广东省、天津省、福建省	广州、深圳、珠海、天津、福州、厦门、平潭	改革开放先行地
第三批	2017 年	辽宁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	沈阳、大连、营口、舟山、宁波、杭州、金义、郑州、洛阳、开封、武汉、宜昌、襄阳、重庆、成都、川南临港、青白江	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第四批	2018 年	海南省(自贸港)	海口、三亚	面向国际的对外开放门户

¹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gov.cn/xinwen/2022-05/02/content_5688416.htm, 访问时间 2023 年 4 月 24 日。

			济南、青岛、烟台、南京、苏州、连云港、南京、钦州、崇左、雄安、正定、曹妃甸、大兴机场、昆明、红河、德宏、哈尔滨、黑河、绥芬河	
第五批	2019年	山东省、江苏省、广西省、河北省、云南省、黑龙江省		推动陆海统筹开放
第六批	2020年	北京省、湖南省、安徽省	北京、合肥、芜湖、蚌埠、长沙、岳阳、郴州	形成全面开放格局

(二) 理论分析和假说提出

企业间收入差距问题的本质来源于不同企业对劳动要素的定价差异。因此，问题转化为异质性企业要素定价问题。本文基于 Melitz (2003) 异质性企业理论和 Helpman 等 (2017) 的思路，构建如下理论模型。

1. 消费者

消费者偏好符合 Dixit 和 Stiglitz (1977) 类型。假设每一个企业生产一种产品，消费者在不同产品中分配总支出 E ，实现特定效用下的支出最小化。

$$\text{Min } E = \int p(v)q(v)dv \quad \text{s.t.} \quad \left[\int q(v)^{\frac{\sigma-1}{\sigma}} dv \right]^{\frac{\sigma}{\sigma-1}} = U \quad (1)$$

其中， $\sigma > 1$ 表示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替代弹性，关于产品 v 的需求 $q(v) = \left[\frac{p(v)}{P} \right]^{-\sigma} Q$ ， $r(v) = R \left[\frac{p(v)}{P} \right]^{1-\sigma}$ ，其中 $Q=U$ ， $P = \left[\int_{v \in V} p(v)^{1-\sigma} dv \right]^{\frac{1}{1-\sigma}}$ 是加总价格指数，满足 $PQ=R$ 。

正如 Akerlof (1982) 所指出，因为利润更高的企业为其员工支付更高的工资被认为是公平的，所以工资溢价被视作激励努力的条件。企业愿意支付工资溢价的原因在于利用工资溢价引导工人付出更多努力。基于此效率工资的想，当我们重点关注企业间收入差距时，可简化假设企业中的所有工人都是一样的工资，即使用企业的平均工资代表其薪资水平。企业利润带来的绩效工资有如下表示：

$$W(0) = 1, W_v = W(\pi_v), 0 < W'(\pi_v) < \infty, W_v \leq \bar{W} \quad (2)$$

上式表达的直觉为，员工工资是关于企业利润的增函数。不失一般性，假设员工工资存在上边界 \bar{W} 。

2. 生产者

假设企业生产方程为关于资本 K 和劳动力 L 的 Cobb-Douglas 型生产函数，正如 Melitz (2003) 研究指出企业间生产率存在差异，以生产率差差异为表征的企业异质性是造成企业

能否在市场中形成市场势力（Market Power）的关键。当我们关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如何通过引致的制度环境变化进而作用于企业行为时，有必要将市场势力区分为两类：第一类，依赖明星企业理论（Superstar-Firm Theory），企业依赖自身优势在市场竞争中胜出，实现市场份额的大规模占有，进一步利用其形成的市场势力在市场中挤压弱势企业，谋取垄断利润（Autor 等，2020）；第二类，依赖 Tullock（1967）指出，即企业通过游说贿赂或者自身特性获得市场之外的力量，借助政治关系，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经济利润。区分市场势力原因在于制度优化带来法治环境的改善将对两类依赖于非正规手段在市场中形成竞争优势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打击，以完善的制度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进行约束是政府维护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和义务。

企业利润表示如下：

$$\pi_v = \text{Max} \left[0, \frac{r_v}{\sigma} - F_v \right] \quad (3)$$

其中 F_v 为企业广义生产成本，区分为生产投入要素成本 f 和非市场势力带来的额外成本 f_M ，具体有

$$F_v = \begin{cases} f + f_M & \text{常规企业} \\ f & \text{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 \end{cases} \quad (4)$$

如前文式子指出企业利润增加将带来员工工资的增加，将企业利润与员工工资联系起来有：

$$\pi_v(W_v) = \begin{cases} 0 & \text{被淘汰企业} \\ \pi_v - (f + f_M) & \text{常规企业} \\ \pi_v - f & \text{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 \end{cases} \quad (5)$$

其中 $\pi_v = \left(\frac{RP^{\sigma-1}}{\sigma} \right) \left(\frac{kW_v^\alpha}{\rho\phi_v} \right)$ ，与效率工资理论的直觉相同，企业利润与员工工资、生产率正相关。

根据 Dixit 和 Norman（2011）的对偶理论，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其通过市场势力获得的超额利润等同于两类企业获得相同利润时，常规企业相对于势力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成本。根据上述模型有如下含义：在获得相同收入时，即使企业生产率相同，常规企业相比于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而言，所需承担的成本更高，进而其雇佣的员工工资更低。鉴于对标国际标准的“制度型开放”实现国内制度优化，将对两种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行为造成冲击，可以提出假说：

假说 1: 自贸区建设带来国内制度优化，有利于减少企业间收入差距。

按照假说 1 的分析逻辑，如果制度优化通过对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行为造成约束，那么其又是如何优化市场中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呢？由于前文将市场势力企业区分为企业依赖自身占有市场份额形成的垄断力量和依赖于政治联系获得的市场势力两种。对于前者，为进一

步促进市场化改革，制度环境优化带来的反垄断力量将给予弱势企业更好的生存环境，即 f_M 减少。换句话说，依赖市场势力对弱势企业造成挤压，进而获得的更大市场份额的明星企业，其依赖于市场势力获得的市场份额将因制度环境优化而被市场中的企业重新瓜分，这有利于弱势企业参与竞争的积极性，市场份额的重新瓜分意味着行业中的市场集中度，因此提出假说 2：

假说 2: 自贸区建设带来国内制度优化，约束明星企业行为，市场份额重新瓜分，市场竞争强度增加导致行业集中度将降低。

此外，如果假说 1 的分析逻辑成立，那么相对于其他不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而言，依赖政治关系和市场垄断势力获得利润的企业其员工面临的负向约束更大。值得指出的是，使用双重差分设计的结果只能刻画出不同主体行为的相对变动而非绝对变化，即这种负向的影响更表现为相对于一般企业而言，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中的员工面临更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可以提出假说 3：

假说 3: 自贸区建设带来国内制度优化，使得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相对于常规企业而言，其员工收入受到更大的负面冲击。

四、数据、变量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所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宏观城市层面数据和微观企业层面数据。宏观数据方面，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以省份（直辖市）命名，但其实施区域只在其下级特定城市中的区域内划定片区实施试点。笔者根据国务院和各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官方网站获取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具体片区信息，人工整理文件中具体划定的自贸片区，以片区所在城市作为受到政策干预的处理组，其余未受到政策干预的城市设为对照组，相关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微观数据方面，本文以 2009—2021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微观研究样本，相关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 Wind 数据库。分析时间段的选择主要出于两点考虑：第一，第一批次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时间为 2013 年，使用双重差分法要求样本中存在政策干预时间点之前的时段；第二，避免纳入 2008 年金融危机冲击对实证结果的干扰，选择以 2009 年为初始时点；参考已有文献做饭，对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第一，剔除银行、证券公司及保险公司等金融类上市公司；第二，删除样本区间内所有 ST 类的企业样本；第三，删除关键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此外，为了避免数据异常值对检验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前后 1% 的水平上进行了缩尾处理，最终得到数据的样本量为 23937。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Obs	Mean	SD	Median	Min	Max
企业间收入差距	23,937	10.4627	1.0254	10.5718	3.4947	15.7778
自由贸易试验区	23,937	0.4119	0.4922	0.0000	0.0000	1.0000
出口依赖度	23,937	18.8513	12.2695	20.5609	0.2222	55.0769
地区经济水平	23,937	3.0210	2.1774	2.0680	0.0389	6.3857
人均 gdp	23,937	2.9454	0.7182	2.8677	0.5880	9.3917
地区发展增速	23,937	19.5360	4.3950	19.7960	5.8377	51.9140
地区产业结构	23,937	9.8506	2.7994	10.4624	2.7942	15.5758
城市人口数	23,937	1.2186	0.1752	1.1913	0.6569	1.4580
城乡人口结构	23,937	1.2167	0.1754	1.1893	0.6569	1.4574
人口密度	23,937	0.3029	0.1650	0.2898	0.0098	1.6319
固定资产投资	23,937	3.4298	0.1889	3.4501	1.1472	3.6587
工资水平	23,937	2.2214	0.0465	2.2151	2.0782	2.2967

（二）识别策略

参考 Beck 等（2010）设置如下多时点双重差分回归方程检验以自贸区建设为表征的制度型开放对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

$$wage_dispersion_{j,c,t} = \alpha_0 + \alpha_1 ftz_{c,t} + \alpha_2 controls_t + u_j + \mu_c + \sigma_t + \epsilon_{i,t} \quad (6)$$

其中，j 表示行业，c 表示城市，t 表示年份。本文根据企业所在城市 c 在 t 年是否处于设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城市设置核心解释变量 ftz，如果企业所在城市 c 在第 t 年挂牌成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则 ftz 取 1，否则取 0。我们重点关注该回归方程中核心解释变量 ftz 的系数，若回归系数 α_1 显著大于 0，则说明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导致拉大了企业间工资差距；若回归系数 α_1 显著小于 0，则说明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减小了企业间工资差距；若回归系数 α_1 与 0 没有显著差异，则说明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企业间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

被解释变量 *wage_dispersion* 是所在城市 c 中的行业 j 中的企业间收入差距，参考 Bonfiglioli 等（2018）的方法，使用城市 c 行业 j 中企业平均工资的标准差作为代理变量，标准差越小，行业内企业间工资离散度越低，企业间收入差距越小。

考虑到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对实证结果的干扰，本文进行城市特征变量进行控制。考虑到城市特征变量随着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的干预也会发生变动，这会可能导致回归方程中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的低估。因此，本文参考已有文献的思路以国家实施第一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即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前一年（2012 年）作为基准期，使用城市的基准期特征变量刻画不同城市固有特征，将其与时间趋势项交互在计量方程中进行控制（Lu 和 Yu，2015）。具体变量包括：城市经济特征变量如年城市生产总值、城市人均生产总值、出口强

度等，城市结构特征变量如制造业产业占比、地区人口密度等变量。 u_j 、 μ_c 和 σ_t 分别代表行业、城市以及年份固定效应分别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行业、城市固有特征以及随时间趋势变化的共同趋势。

五、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共同富裕效应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3 汇报了基准回归结果。表 3 列（1）为控制城市、行业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实证结果，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列（2）~列（3）进一步加入城市经济控制变量和城市结构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小于 0，即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显著降低了企业间收入差距¹。具体而言，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城市中的企业间收入差距相对于未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的城市而言，行业中企业平均收入的离散程度减少，具体的效果为：自贸区建设使得企业间收入差距标准差减少 12.5%，证实了本文的核心假说 1。正如理论分析部分指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带来企业间收入差距缩小的可能原因在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通过对标国际制度，实现国内制度环境和市场营商环境的优化，国内市场环境优化对依赖市场势力获得利润的企业行为形成约束，进而使得市场中的企业间收入差距显著降低，对于这种可能性的解释将在下文中进一步检验。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企业间收入差距		
	(1)	(2)	(2)
ftz	-0.271*** (0.068)	-0.236*** (0.061)	-0.253*** (0.065)
出口		2.707*** (1.002)	2.733* (1.495)
经济发展水平		-35.401*** (8.770)	-31.912** (12.051)
人均 GDP		52.380** (23.267)	43.104** (21.000)
经济增长率		4.854 (3.422)	3.067 (3.574)
产业结构		-15.715*** (5.641)	-10.342* (5.769)

¹ 限于篇幅未报告控制变量系数，备案。

人口规模			1,669.135*
			(989.036)
人口结构			-1,523.037
			(1,006.793)
人口密度			-205.840***
			(77.663)
地区资产水平			103.715
			(98.928)
地区收入水平			-695.165
			(674.788)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23,937	23,937	23,937
R 方	0.313	0.393	0.397

注：括号中是行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1%、5%和 10%显著性水平分别对应*** $p<0.01$ ** $p<0.05$ ，* $p<0.1$ 。（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1. 事件研究法

本文实证设计使用的核心识别方法为多时点双重差分法，该方法的使用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本部分使用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对平行趋势和政策动态效果进行检验。如图 1 所示，政策干预前回归系数不显著异于 0，政策干预之后显著小于 0，且随着时间推移自由贸易试验区带来的长期效果趋于平稳，即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制度环境的改善可能是形成良好市场环境，实现市场中企业公平竞争的一种长效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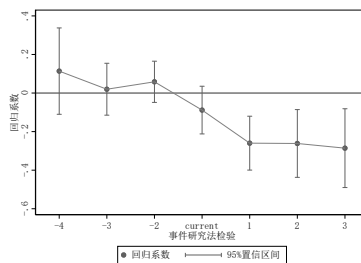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2. 异质性处理效应

因不同个体接受处理的时间不同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因果识别，但该方法面临控制组样本与处理组样本之间存在动态调整问题，这使得对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得到的处理效应存在局限性。正如 Goodman-Bacon (2021) 指出，多期双重差分估计依赖于“条件

于群组与时间固定效应，干预应当近似于随机分配”的一般假定，双向固定效应估计量等于所有可能的两期双重差分估计量的加权平均值。这意味着该方法的使用可能面临负权重问题，这会导致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无法较好的反映政策带来的净处理效应，对该系数的解释存在模糊性。为了缓解该问题对实证结果的威胁，本文对每一次政策实施进行单一时点的双重差分估计检验，实证结果如图 2 所示，可以看到整体而言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数，特别是 2013 年上海作为初次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批次，其更满足外生性，实证结果显示第一批次的自贸区建设带来企业间收入差距的缩小效果更明显，证明了本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此外，该检验同时回应了不同批次自贸区建设对于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可以看出不同批次对于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虽然程度不同，但整体趋势为负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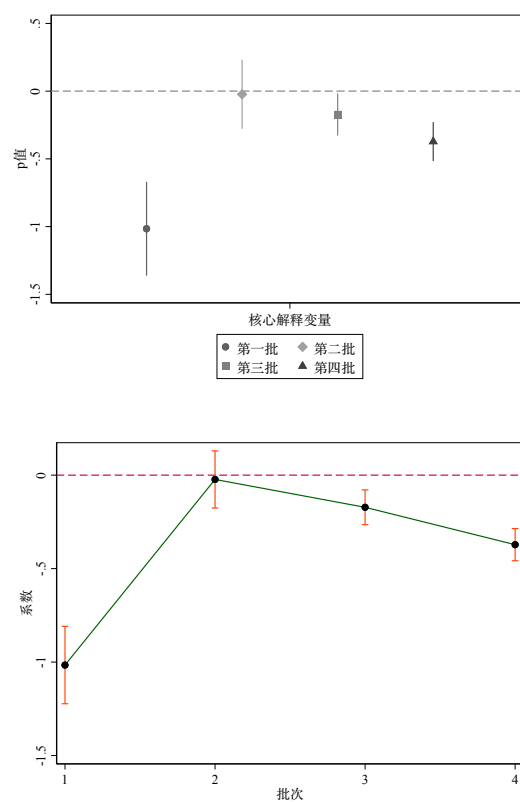


图 2 单一时点检验

除了进行单一时间点双重差分检验缓解负权重问题对实证方法的威胁，本文参考 Goodman-Bacon (2021) 提出的 Bacon 分解方法进行分解，分解结果限制时间组 (Timing-Group) 能够占据整体系数权重达到 73.098%，组内差异权重占比只有 0.05，结果稳健¹。

3. 随机模拟

考虑到政策选择具有自选择性，本文基于自助法 (Bootstrap) 对政策发生时点和政策实施地点进行 500 次随机模拟实验估计，结果如图 3 所示，模拟实验系数聚集在 0 附近，回归

¹ 分解结果时间组权重为 0.7308747616，其他部分对于回归系数的影响很小。此外，本文基于 de Chaisemartin 和 D' Haultfoeuille (2020) 方法计算出负权重占比为 0.15，不会严重威胁实证结果。

显著显著小于 0，通过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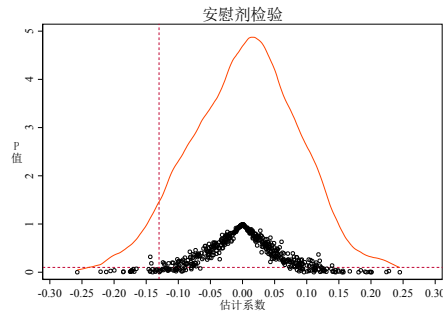


图 3 Bootstrap 随机模拟

4. 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结果稳健，本部分继续采用替换指标、调整样本等多种方式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4 列（1）～（5）。列（1）使用将行业层面计算的企业间收入差距加总到城市层面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回归分析，实证结果仍然显著为负数，此时系数绝对值变大是因为将企业间收入差距指标聚集到城市层面放大了政策效果；限于最后一批城市批准时间较短，考虑到政策效应需要时间反应，因此将第六批试点城市剔除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列（2）所示，核心解释变量仍然显著为负数；考虑到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特殊性，将其进一步剔除，回归结果如列（3）所示，核心解释变量仍然显著为负数；基准回归使用的是非平衡面板数据，列（4）为将实证数据处理为平衡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的结果，核心解释变量仍然显著为负数；虽然为避免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本文选取 2008 年之后的年份为研究起始点，但考虑到中国为应对 2008 年金融危机采取了“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避免财政政策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本文参考 Campante 等（2023）将回归样本进一步限制在 2011 年之后，实证结果如列（5）所示，核心解释变量仍然显著为负数¹。

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城市级变量	剔除最后一批	剔除自贸港	平衡面板	避开财政政策
	(1)	(2)	(3)	(4)	(5)
ftz	-0.614*** (0.014)	-0.219** (0.084)	-0.226*** (0.082)	-0.200*** (0.064)	-0.203*** (0.05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¹ 关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区域溢出效应，因为自贸区设立只是城市内的一小片区，如果该片区对该城市内其他地区（协同区）带来溢出效应，则将核心解释变量设定为城市层面则更为合理，此时的空间溢出增加实证结果的可靠性。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3,937	19,392	19,283	4,694	21,043
R 方	0.680	0.395	0.396	0.407	0.398

六、自贸区建设如何促进共同富裕

通过前文理论分析可知，企业异质性是导致企业间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为回答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如何影响企业间收入差距，下文分别从市场竞争效应、融资约束效应以及生产率效应三个方面进行机制检验。

（一）市场竞争效应

自由贸易试验区积极推动制度创新，深化首创性、集成化、差别化改革探索，是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先行示范区。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部实施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准入前国民待遇、外资项目核准制改备案制和简政放权等举措带动国外资本和国内其他地区资本向该地区注入的积极性，进而促进市场竞争程度，形成更加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毕青苗等，2018；佟家栋等，2022）。具体而言，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带来的制度优化可以对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行为进行约束。一方面，明星企业利用其市场份额优势形成的市场势力进一步挤压弱势企业，扩大市场份额。制度优化对垄断行为监管强度增加，依赖于市场势力获得的市场份额将被市场中的企业重新瓜分，调动弱势企业参与到市场竞争中的积极性从而增强整个市场的竞争性，即制度优化通过约束明星企业的垄断势力降低市场集中度；另一方面，依赖于政治关系形成“经济租金”的企业，因制度环境优化，寻租行为与依赖政治关系获得利润的行为受到制约，更为严格的管控约束这类企业利用其政治关系在市场中形成超额利润，这将促进弱势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同样有利于增加市场竞争程度。本文通过企业销售额以及主营业务收入计算行业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 HHI）作为市场竞争程度的代理变量，检验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带来的市场竞争效应¹。实证结果如表 5 列

（1）所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显著降低了行业集中度，即自由贸易试验区假设有利于市场竞争程度增加，进而缩小企业间收入差距²。

¹ 考虑销售额衡量的是企业在全国乃至全球的销售量，关于是否可以使用销售额进行行业集中度的计算，根据异质性企业理论，只有生产率高、经营能力强的企业才能走出本地甚至走到海外，因此我们认为能够在外部市场中存活的企业其在本地必然具有足够大的市场势力。

² 回归表 5 汇报的结果为使用销售额计算的行业集中度，基于主营业务收入计算的结果稳健，限于篇幅，未放入正文中，备索。

（二）融资约束效应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带来的市场竞争效应是基于企业面临的对外部环境约束形成，自贸区建设如何通过影响企业自身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通过对标国际制度实现国内制度优化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强制度改革的一个方面，此外，“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的政策导向给予了自贸区一定的自主权，权力下放和容错机制的引入有利于减轻地方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的运行压力。这使得自贸区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有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有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强化金融机构借贷供给意愿（Lan 等 2020；李鑫和叶永卫，2023），缓解弱势企业与势力企业之间的融资约束不平等程度，从内部促进微观主体参与到市场竞争的积极性和可行性。为检验制度质量的提升是否缓解了企业间的融资约束不平等程度，本文通过构建企业融资约束指数 SA，同时计算行业内不同企业间融资约束的离散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 5 列（2）实证结果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减弱了企业间对于融资约束的离散程度，即融资约束的不平等程度降低。

（三）生产率效应

市场竞争效应意味着企业面临的竞争程度不断增加，为了能够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生存，提升自身生产率是企业的理性行为。融资约束的缓解为企业通过创新行为提升生产率提供了可行性。因此本文继续考察自贸区建设对生产率的离散程度影响如何？如果生产率趋同则意味着低生产率企业对高生产率企业的追赶，进而造成企业间收入差距减小。如果生产率离散程度增加，将与基准实证结果的逻辑相违背，这意味着不健康的市场环境。实证结果如表 5 列（3）~列（4）所示，无论使用 lp 算法还是 op 算法计算出的生产率不平等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对此结果有如下解释：首先，企业提升生产率是一个长期过程且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实证结果可能尚未显著；更为重要的是，生产率更多取决于企业本身，自由贸易试验区带来的制度优化更多地扮演“服务性政府”的角色，并不直接干预企业自身发展，所以生产率在企业间分布没有因制度环境的优化而显著变化。回归系数不显著意味着生产率在企业间的分布未发生明显变化，即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高生产率企业继续提升自身生产率形成“竞争逃离”，低生产率的企业提升自身生产率避免“淘汰”健康的市场环境。

表 5 机制检验

	市场竞争效应	融资约束机制	生产率趋同	
	(1)	(2)	(3)	(4)
核心解释变量	-0.042**	-0.037*	-0.003	-0.003
	(0.016)	(0.020)	(0.007)	(0.00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0,537	20,537	20,537	20,537
R 方	0.496	0.514	0.678	0.679

（四）异质性考察

考虑到不同类型企业和地区的禀赋不同，自贸区建设对企业间收入差距可能存在差异，为更细致的理解制度型开放对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下文进行异质性分析。

1. 企业类型

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国内制度优化。由于制度非中性，所以预期制度优化对市场势力的企业的影响程度可能更大。本部分以企业是否具有市场势力为标准对进行样本分类异质性检验，进而达到强化本文的理论逻辑的作用。哪些企业属于具有市场势力呢？“超级明显企业理论”指出大规模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其市场势力挤压弱势企业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获得垄断利润（Autor 等，2020）。Tullock（1967）指出企业可以通过与政府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在市场中获得“经济租”。对于前者，本文根据地区-行业层面的企业规模均值区分为明星企业和普通企业；对于后者，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程度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更强（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因此本文根据实际控制人的所有制类型将国有企业视作政治关联强的企业，非国有企业为政治关联弱的企业。表 6 列（1）~列（4）是实证结果显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于明星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员工工资的负面效应显著大于常规企业，验证了理论模型中提出的假说 2 和假说 3。正如 Topalova（2010）所强调的，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检验其系数反应的是组别间的相对变化，即回归系数为负数意味着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中的企业相对于未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企业而言收入降低，其并不意味着员工收入的绝对降低而是相对降低，因此这并不违背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将国有企业代理为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其影响存在两方面的可能，一方面是约束其通过政治关联占据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政治关联紧密意味着其更服从于政策导向，即具有更显著的 ESG 表现，这可能反映了国有企业对政策形成反馈的“示范效应”。

表 6 企业异质性

变量	被解释变量：员工平均工资
----	--------------

	(1)	(2)	(3)	(4)	(5)	(6)	(7)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明星企业	普通企业	沿海	内陆	三重差分
核心解释变量	-0.047**	-0.007	-0.041*	-0.008	-0.333***	-0.257***	-0.281***
	(0.023)	(0.011)	(0.021)	(0.014)	(0.106)	(0.072)	(0.10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6,920	11,493	8,836	9,435	10,853	13,084	23,937
R 方	0.706	0.796	0.771	0.767	0.414	0.392	0.396

2. 沿海内陆异质性

深化差别化改革探索是推进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本质要求，前文对不同批次的自贸区设立对企业间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发现，尽管批次不同，但整体上均有助于企业间收入差距的缩小。为深化对研究问题的理解，本部分进一步以地理位置为视角对自贸区进行异质性检验，实证结果如表 6 列（5）～列（6）所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进行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均显著缩小了企业间收入差距。列（7）引入地区变量进行三重差分估计显示，沿海地区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企业间收入差距缩小的作用大于内陆地区。对于这一结果的理解，可能是因为沿海地区本身市场化程度更高，对于政策的贯彻更为彻底，因此政策效果更大。

七、扩展性分析

截止目前，上文讨论的均是企业间收入差距，这是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考虑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多维度的，尽管我们研究指出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带来的制度优化缩小了企业间收入差距，但很自然想要提问：企业间收入差距的缩小具体是如何反应的？即是否因为企业高管加强对普通员工压榨造成企业间收入差距的结果？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企业内收入差距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7 显示，整体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说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考虑到整体回归分析会掩盖异质性处理效应并且本文的理论逻辑指出自贸区建设主要作用于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因此有必要再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降低了，促进了企业内的共同富裕。明星企业的异质性虽然是不显著的，但是明星企业的回归系数与普通企业相反，为负数，也意味着比较好共同富裕预期。此外，通过对于国有企业与明星企业的回归系数，

国有企业显著为负数一定程度回应前文指出国有企业具有更大的政策“示范效应”，即作为政府强加政治关系的国有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表 7 制度优化与企业内收入差距

变量	被解释变量：企业内收入差距				
	整体	所有制		企业规模	
		国企	非国企	明星企业	常规企业
	(1)	(2)	(3)	(4)	(5)
核心解释变量	0.553 (0.563)	-0.395** (0.191)	1.320 (1.083)	-0.178 (0.182)	1.566 (1.37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8,579	6,929	11,509	8,837	9,460
R 方	0.129	0.737	0.141	0.766	0.139

八、结论与建议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在这历史性的时期，中国政府提出通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不同于过去“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只有通过高质量发展模式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满足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开放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的论调在国际贸易领域支持者众多（Autor 等，2013），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制度型开放”是否会加大收入差距？如何通过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推动共同富裕建设？为寻求答案，本文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视做准实验，基于 2009~2021 年上市企业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进行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显著降低了企业间收入差距，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仍然成立。具体地，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的实施使得企业间收入差距标准差下降了 12.5%。制度优化带来的市场竞争效应和降低融资约束不平等程度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减少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可能渠道。此外，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在降低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同时，并没有显著增加企业内收入差距，具有较好的共同富裕效应。

随着《国务院关于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第六批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的通知》（国

函（2020）96号）等政策的出台，我国已根据不同地区优势设立不同属性的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不断深化，其创新成果广泛应用于其他地区（王明益等，2023）。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经济特区的“政策洼地”建设，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既通过聚焦于高水平的投资开放和贸易开放刺激本地的创新驱动发展，又通过制度优化完善了利益分配机制，是一次典型的具有多种制度红利的顶层设计。因此，中国在未来有必要继续深化推荐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加块对全国各地进行遴选，将制度创新带来的红利推广和复制到更多地区，这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 [1] [美] 阿维纳什·迪克西特、维克多·诺曼著，李辉文、韩燕译：《国际贸易理论对偶和一般均衡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 [2] 毕青苗,陈希路,徐现祥,李书娟.行政审批改革与企业进入[J].经济研究,2018,53(02):140-155.
- [3] 陈钊,万广华,陆铭.行业间不平等:日益重要的城镇收入差距成因——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J].中国社会科学,2010(03):65-76+221.
- [4] 韩瑞栋,薄凡.自由贸易试验区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视角[J].国际金融研究,2019(07):36-45.
- [5] 韩振国,朱洪宇.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优势或政策陷阱——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时空分析[J].经济学家,2022(04):89-98.
- [6] 黄少安,孙璋.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否优化了服务业资源配置? [J].社会科学战线,2023(03):80-94+281.
- [7] 蒋灵多,陆毅,张国峰.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中国出口行为[J].中国工业经济,2021(08):75-93.
- [8] 李鑫,叶永卫.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契约执行环境改善的视角[J].国际贸易问题,2023(01):142-157.
- [9] 李实,朱梦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促进共同富裕实现[J].管理世界,2022,38(01):52-61+76+62.
- [10] 李子联,刘丹.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质量效应”研究[J].经济学家,2021(09):58-68.
- [11] 李磊,刘早云.进口竞争、管理者激励与企业内部收入差距[J].国际贸易问题,2023(07):138-156.
- [12] 刘灿雷,王永进.出口扩张与企业间工资差距:影响与机制[J].世界经济,2019,42(12):99-120.
- [13] 刘文革,何彤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上市公司海外并购的双重差分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2,38(11):73-84.
- [14] 陆雪琴,田磊.企业规模分化与劳动收入份额[J].世界经济,2020,43(09):27-48.
- [15] 任晓怡,苏雪莎,常曦,汤子隆.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企业数字化转型[J].中国软科学,2022(09):130-140.
- [16] 田卫民.中国市场化进程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分析[J].当代财经,2012(10):27-33.

- [17] 田青. 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M]. 科学出版社, 2011.
- [18] 佟家栋,张千,佟盟.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现状与思考[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4):1-13.
- [19] 王爱俭,方云龙,于博.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区域经济增长:传导路径与动力机制比较[J].财贸经济,2020,41(08):127-144.
- [20] 王明益,陈林,张中意,姚清仿.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协同创新网络效应:空间断点与地理识别[J].世界经济,2023,46(03):94-124.
- [21] 王智新,邢双美,韩承斌.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跨境电商发展: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世界经济研究,2023(02):19-33+134.
- [22] 王筱筱,卢国军,崔小勇.自动化是否扩大了企业内部收入差距——来自制造业非国有上市公司的证据[J].经济科学,2023(04):85-103.
- [23] 吴万宗,徐娟.中国工业出口强度与工资残差不平等——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J].财贸经济,2017,38(05):112-128.
- [24] 许晨曦,牛志伟,董启琛.制度环境变革对企业融资方式的影响——基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J].改革,2023(02):139-154.
- [25] 许晨曦,董启琛,许江波.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评论,2023,35(02):38-51.
- [26] 杨继东,江艇.中国企业生产率差距与工资差距——基于 1999—2007 年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J].经济研究,2012,47(S2):81-93.
- [27] 叶林祥,李实,罗楚亮.行业垄断、所有制与企业工资收入差距——基于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1(04):26-36+187.
- [28] 张川川.出口对就业、工资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微观数据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5,14(04):1611-1630.
- [29] 赵春明,李宏兵.出口开放、高等教育扩展与学历工资差距[J].世界经济,2014,37(05):3-27.
- [30] 周文慧,钞小静.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推进中国高质量出口了吗?[J].经济评论,2023(02):92-106.
- [31] Acemoglu D, Johnson S, Robinson JA.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Dec 1;91(5):1369-401.
- [32] Acemoglu D, Johnson S, Robinson JA. Hither Thou Shalt Come, But No Further: Reply to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Comment".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1 Apr 21.
- [33] Akerlof GA. Labor contracts as partial gift exchang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2 Nov 1;97(4):543-69.
- [34] Aghion P, Howitt P, Violante GL.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 and wage inequ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2 Dec 1:315-45.

- [35] Albouy DY.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com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Oct 1;102(6):3059-76.
- [36] Amiti M, Davis DR. Trade, firms, and wages: Theory and evidence.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2 Jan 1;79(1):1-36.
- [37] Amendola A, Easaw J, Savoia A. Inequality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Public Choice*. 2013 Apr;155:43-60.
- [38] Akerman A, Helpman E, Itskhoki O, Muendler MA, Redding S. Sources of wag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May 1;103(3):214-9.
- [39] Autor D, Dorn D, Katz LF, Patterson C, Van Reenen J. 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nd the rise of superstar firm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0 May 1;135(2):645-709.
- [40] Beck T, Levine R, Levkov A. Big bad banks?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bank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0 Oct;65(5):1637-67.
- [41] Bonfiglioli A, Crinò R, Gancia G. Betting on exports: Trade and endogenous heterogeneity. *The Economic Journal*. 2018 Mar;128(609):612-51.
- [42] Bustos P. Trade liberalization, exports, and technology upgrading: Evidence on the impact of MERCOSUR on Argentinian fir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Feb 1;101(1):304-40.
- [43] Campante FR, Chor D, Li B. The political economy consequences of China's export slowdown.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23 Feb 6;jvad007.
- [44] Chong A, Gradstein M. Inequality and institution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7 Aug 1;89(3):454-65.
- [45] Dai M, Xu J. The Skill Structure of Export Wage Premium: Evidence from Chinese Matched Employer–Employee Data. *The World Economy*. 2017 May;40(5):883-905.
- [46] Davidson C, Matusz SJ, Shevchenko A. Globalization and firm level adjustment with imperfect labor marke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8 Jul 1;75(2):295-309.
- [47] Faggio G, Salvanes KG, Van Reenen J. The evolution of inequality in productivity and wages: panel data evidence.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10 Dec 1;19(6):1919-51.
- [48] Helpman E, Itskhoki O, Redding S. Inequality and unemployment in a global economy. *Econometrica*. 2010 Jul;78(4):1239-83.
- [49] Helpman E, Itskhoki O, Muendler MA, Redding SJ. Trade and inequality: From theory to estima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6 Jun 29;84(1):357-405.
- [50] Lan F, Wang W, Cao Q. Tax cuts and enterprises' R&D intensity: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Economic Modelling*. 2020 Jul 1;89:304-14.

- [51] Li H, Xu LC, Zou HF. Corrupti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Economics & Politics*. 2000 Jul;12(2):155-82.
- [52] Lu Y, Yu L.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markup dispers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WTO access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5 Oct 1;7(4):221-53.
- [53] Melitz M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2003 Nov;71(6):1695-725.
- [54] Macis M, Schivardi F. Exports and wages: rent sharing, workforce composition, or returns to skill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16 Oct 1;34(4):945-78.
- [55] Redding SJ. Theories of heterogeneous firms and trade. *Annu. Rev. Econ.*. 2011 Sep 4;3(1):77-105.
- [56] Sampson T. Selection into trade and wag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 2014 Aug 1;6(3):157-202.
- [57] Tullock G. The welfare costs of tariffs, monopolies, and theft. *Economic inquiry*. 1967 Jun;5(3):224-32.
- [58] Verhoogen EA. Trade, quality upgrading, and wage inequality in the Mexican manufacturing sector.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 May 1;123(2):489-530.
- [59] Yeaple SR. A simple model of firm heterogeneity,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wag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5 Jan 1;65(1):1-20.